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学刊
第23期，2019年，页17-32

Journal of Malaysian Chinese Studies
Volume 23, 2019: 17-32

“五四与南洋：五四运动一百周年”纪念专号
May Fourth Movement and Nanyang: Special Issue on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新加坡的五四纪念：以1949年至2009年的新闻报道为分析史料

May Fourth Commemoration in Singapore: An Analysis of News Reports from 1949 to 2009

黄贤强 / 孙雅惠
(WONG Sin Kiong / SUN Ya Hui)

摘要

新加坡华人社会对百年前发生在中国的五四运动及其影响一向相当关注。本文重点讨论1949年至2009年间新加坡报章如何报道和纪念五四运动，以及新加坡官方与舆论对五四运动的态度。征引的材料以新加坡出版的《南洋商报》及1983年之后的《联合早报》的报道为主。文章分五时段来讨论，分别为1949-1965年、1966-1976年、1977-1989年、1990-1999年和2000-2009年。作者将呈现每一个时段的五四运动纪念报道的特性，以及其与中国政局和新马当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的密切的关系。

关键词：五四运动、新加坡、纪念、新闻、评论

黄贤强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副教授。E-mail: chswsk@nus.edu.sg
孙雅惠 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学系荣誉学士。E-mail: e0041989@u.nus.edu

© Centre for Malaysian Chinese Studies, Kuala Lumpur 2019

Abstract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Singapore has concerns about the impact and consequences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which took place in China a hundred years ago. This article discusses how Singapore Chinese newspapers commemorated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and how Singapore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public opinion evaluated the mass movement between 1949 and 2009. The sources for discussion include the Singapore-based *Nanyang Siang Pau* and *Lianhe Zaobao*. Five different periods are highlighted for discussion, i.e., 1949-1965, 1966-1976, 1977-1989, 1990-1999 and 2000-2009. The authors illustrat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ay Fourth commemoration during each period, and analyze how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in China, political-economic-social environment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 intertwines with the quantity and nature of the May Fourth commemoration.

Keywords: May Fourth Movement, Singapore, Commemoration, News Reports, Commentaries

一、前言

1919年5月4日爆发的五四运动至今已有100年的历史。在历史的长流中，五四运动一直是知识分子心中沉重且无法撇弃的历史课题。这个发生在中国的历史事件的导火线在国外，其影响则不限于中国。如果我们采取广义的角度来看待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指的不只是因不平等条约和巴黎和会所引爆的反日游行，它也包括1915年起开始发酵的新文化运动和新思潮的传输。从这一方面出发或许更能发现五四运动在文化和社会上的改造，也影响了一直与中国历史和文化有着紧密联系的新加坡。

黄贤强和施彦的文章〈五四纪念在新加坡——以华文报章的报道和华社记忆为中心〉（2009：619-641）曾探讨了1919-1939年间新加坡报章对五四运动的纪念报道及华人社会的记忆。本文则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尤其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2009年间，新加坡报章如何报道和纪念五四运动，以及新加坡官方与舆论对五四的态度。结构方面，文章将1949-2009年有关五四纪念的报道分为五时段来分开讨论，分别为1949-1965年、1966-1976年、1977-1989年、1990-1999年和2000-2009年。前两

个阶段涉及新加坡在1965年独立前后的政治史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对新加坡的五四运动纪念报道造成影响。1977年之后，则将以约每十年为一段落的方式进行分析。征引的材料以每年五四纪念日前后约十天的《南洋商报》及1983年之后的《联合早报》的报道为主。文章将尝试理解每一个时段的五四运动纪念报道的特性，以及其与新马当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有何密切的关系。

二、1949至1965年的报道

1949年至1965年间，新加坡《南洋商报》共有九篇有关五四纪念的报道（有关篇目，参见附录2）。当中，半数的文章都以新文化运动为纪念五四运动的切入点。这些报道的叙述性较强，但也对新文化运动作出评价，并检讨五四运动失败的原因。例如，〈五四运动与刊物〉（1961年5月4日）一文中，作者就质疑很多中国的五四青年将西方思想著作“生吞活剥”，没有真正弄清楚这些哲学和文化思想的本质，才导致他们在新旧思想的冲突下“陷入迷茫”。另一篇文章〈五四运动的再认识〉（1951年5月4日）则直接批判中国共产党自执政以来的政治思想“阻碍”了五四运动以来演进和形成的民众政治和民生主义。仅有一篇文章，即〈五四运动的意义〉（1950年5月4日）给了五四运动正面评价。因此，五四运动在1949-1965年间在新加坡报章中是毁多于誉的，而且整体而言，关注度也较低。即使报章正面回应新文化运动，其历史叙事性也是高于价值评判。

新加坡华文报章之所以会呈现这样的态度，笔者认为其中政治原因至关重要。1949年的中国经历了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最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自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日军侵略中国东北到1942年2月新加坡被日军沦陷前，新加坡华商和民众对中国的财政支援、精神支持和在抵制日货运动中，可以看出新加坡华人在当时还是非常关心中国，而且把中国视为情感依托的祖国（崔贵强1989：2-9）。这种特殊的情结在1949年之后依然没有立即消退，因此这阶段新加坡华人对五四运动的纪念，特别是新文化运动的关注是可以理解的。

另一方面，报章舆论对新中国的共产意识形态也是警惕的，尤其是1949-1965年间在东南亚盛行的左派运动和共产主义宣传。自二战之后，很多亚洲的共产党受到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所输出的革命思想的鼓舞，开始蠢蠢欲动（李亚男2014：8-13）。对二战之后饱受贫困和失业的人来说，共产主义无疑比西方帝国殖民统治下的资本主义剥削来得更具吸引力。这正好符合当年参与五四运动的学生和工人因爱国和反帝国主义而发起的抗议游行的初衷。这也是为什么在1950、60年代有不少新加坡华人同情马来亚共产党，甚至在地下共产党的影响下，学生和工人效仿五四运动，纷纷上街抗议殖民地政府的统治及其政策。这一系列跟华人及共产主义有关的反殖抗议让殖民地政府感到困扰和痛恨。其实，英殖民政府就因为防止共产思想进一步渗入新马社会而在1948年颁布“紧急法令”，宣布马来亚进入戒严状态，对马来亚共产党进行十二年的围堵和清剿。由于1921年成立的中国共产党自称其成立与五四运动息息相关，尤其是五四和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如陈独秀和李大钊等人都是中共的第一代领导人，而中国共产党和马来亚共产党有兄弟党的关系，所以对英殖民地政府而言，“五四运动”是一个和共产主义、反帝国主义有关的危险符号。因此，《南洋商报》并没有积极报道五四运动的周年纪念，而出现的评论文章也是贬多于褒，在这种政治氛围下是可以理解的。

三、1966至1976年的报道

这十年阶段正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期，也是极左思想和政治斗争横行的年代。《南洋商报》在这十年中，仅有三篇与五四运动纪念有直接相关的评论文章，而且三篇报道全都转载自香港的新闻社，没有社论。其中，两篇报道文章的叙事性比较强。一篇题为〈庆祝中国青年节北京万余位青年参加持火炬赛跑〉（1973年5月5日），讲述了北京如何在北京大学里庆祝中国青年节，开幕仪式选择在前北京大学校园里举行，因为这里也是54年前北京学生展开五四运动的历史纪念地。另一篇〈五四运动五十七周年北京限制集会防范发生事件〉（1976年5月5日）则报道了五四运动

57周年庆祝活动在官方戒备下举行。最后一篇〈中国纪念五四运动知识分子有大缺点 须以工农商兵为导师参加进行阶级斗争增加生产发展科学〉（1969年5月5日）的批判性较强，它指出知识分子“优柔寡断，做事不彻底”，所以他们必须向工、农、商、兵学习克服这些问题，以便为工、农、商、兵效劳。

这期间新加坡对五四运动纪念的报章是所有时段最少的。政治考量是主要因素，1965年独立的新加坡，不仅要应付邻近国家的猜忌，也面临日益严峻的苏联和美国领导的冷战。另一方面，就新加坡的内部发展而言，新加坡在建国之初面临的问题主要是培养国人的国家意识和身份认同感，过于重视或纪念中国的五四运动对当时的新加坡没有任何好处。除此之外，如果以华人居多的新加坡要保护其独立自主和安全，它就必须和中国保持距离，以免让马来西亚和印尼等邻国认为新加坡是“第三中国”。这就是为什么新加坡政府表明自己只会在印尼与中国建交后，新加坡才会与中国建交，成为最后一个与中国建交的东南亚国家。纵使1970年代初中、美关系破冰，新加坡仍旧坚持之前的立场。

纵观这个阶段的五四运动的报道和评论不像前一阶段（1949-1965）般那样的具有批判色彩。但对五四运动进行褒扬也不符合新加坡当时的政治立场。毕竟，除了反封建和反旧思想的内容有些相似外，五四运动的本质与充满政治批斗的文革有所不同。而且，新加坡报章如果正面报道五四恐怕会牵扯出东南亚的共产党的历史及其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徒增邻国对新加坡的警惕。所以这时期，新加坡报章索性“不予置评”来代表新加坡对五四的态度。

四、1977至1989年的报道

1976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结束，1978年在邓小平的带领下中国进行改革开放。在接下来的经济改革中，除了原有的国营企业，中国逐步允许成立小型私营公司。这样的改革开放松绑了原有计划经济，并以促进经济增长为由开始接受外来投资。1979年邓小平访问新加坡，发现新加坡政府能

在经济快速增长下依然能严控社会。此后，邓小平把新加坡认定为中国改革开放中可借鉴的国家（李元瑾2009：51-61）。双方签订协议在对方的国土设立贸易代表处，加强两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新加坡在这期间可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咨询顾问。另一方面，新加坡非常看好中国市场，并希望新加坡华人可以利用语言和文化背景的优势抢占刚刚开放的中国市场。新加坡政府在1979年起除了继续执行以英文为主的语文政策，也推出“讲华语运动”并提倡母族文化。除了经济合作，新加坡也建议中国如果想要跟东南亚国家和平相处就必须放弃对东南亚的共产党的支持（邓小平与新加坡，2018年11月12日）。中国之后也确实慢慢调整了对东南亚共产党的态度。从新、中两国在这阶段的融洽关系及中国对东南亚共产党的消极态度可以解释为什么五四运动的课题慢慢在新加坡引起更大的关注。

新加坡政府在1983年将原有的《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合并为《南洋商报星洲日报联合早报》，简称《联合早报》，以方便辅导办报方针。次年开始有更多有关五四运动纪念的文章报道。1989年五四运动70周年之际，新加坡《联合早报》大量刊登五四纪念文章，甚至推出了“写给五四”和“给五四写信”的专题报道（写给“五四”，1989年5月7日）。此外，1989年五四运动纪念的报道无可避免的和1989年4月15日开始的一系列的中国学生运动联系在一起。在这样一个情境下，有些作者在报章文章中表达对学运表示同情。例如，〈中国当前学运与“五四”纪念〉（1989年5月4日）一文的作者就写道，学运如果能“促进民主机制就是给五四七十周年的大礼。”但也有作者对学运抱着悲观的态度，毕竟五四运动所追求的理想在过去七十年都没有成功实现，现在也“不要太认真。”（杜红1989）总的来说，因为大部分的作者通过五四纪念文章来表达他们对五四运动的失望和遗憾，并感叹中国知识界之所以仍然热衷高唱五四运动，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完成五四的目标（港台报章评“五四”：五四运动感言，1989年5月6日），以至在五四运动七十年后学生还在“原地打转”，试图打倒封建争取民主（1919-1989不可分解的血缘关系，1989年5月4日）。这种论调和态度是1989年以前五四纪念报章中所不见的。

这阶段五四纪念文章的激增（共有26篇）也是顺应新加坡政府对中华

文化的重新关注，毕竟新加坡报业控股公司和旗下的《联合早报》一直都是反映政府立场的媒体公司。再者，文章作者对五四运动发展的结果的惋惜何尝不是对新加坡华校在1970年代之后开始没落和受到改制的情感反射（金进2017：165）。最后，或许是因为新加坡政府与中国政府越来越有默契，基于政治正确，有作者刻意强调新加坡华人和中国只存在文化同源的关系，并表明新加坡始终是一个主权独立并以自身利益出发的国家。

五、1990至1999年的报道

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纪念结束后，新加坡在之后的十年对五四运动的纪念和报道就显得没那么热络了（共有11篇）。有关五四的文章又再呈现比较负面的评价，甚至批评中国如何在五四运动引进西方科学和民主后滑入“全盘西化”的陷阱。在〈重新评价五四〉的报章里，作者就提出五四全盘否定传统文化，使文学创作“缺乏传统文化的继承”、“陈腔滥调”，大不如五四运动以前的古典作品（重新评价五四，1999年5月10日）。最后更指出五四运动后期被政治化和极端化，以致中华文化圈难以再现五四的独立批判精神（五四是场文化觉醒，1999年5月9日）。

新加坡报章在这阶段的报道特点，与中国政府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禁止五四运动纪念活动有关。正如上文介绍，1989年发生的一系列学生运动最后发展成“天安门事件”，学生打着五四运动民主的旗号希望中国共产党实行民主政治，这对1949年执政以来一直“以党领政”的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念是冲突的。讽刺的是五四运动这个曾经被视为催生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要政治运动，在1989年变成了质疑中国共产党政治合法性的一种工具。6月4日中国政府在天安门广场对示威学生的镇压引来了国际上的严厉批判，相继而来的是西方国家对亚洲民主和人权问题的质疑。当时，新加坡并没有像西方国家一样严厉指责中国。无独有偶，马哈迪和李光耀都提出了“亚洲价值”的辩论（Asian Value Debate）挑战西方的自由民主主义。他们认为西方国家所提倡的以个人为主的民主和人权概念并不适用于亚洲。他们也认为“亚洲价值”让原本贫瘠的亚洲经济快速发展，所以亚

洲把经济和社会发展放在政治和民权发展之上并没有什么不对之说。

综上所述，1990-1999年的五四报道骤减并延续之前对五四运动的负面评价有可能是受到了中国在1989天安门事件的影响。这期间新加坡也面临西方国家对新加坡和中国政治体系的不理解和评判。于是这期间的报章以批评中国全盘西化，缺乏文化传承的角度探讨五四，并强调当时的中国有条件可以像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一样，“抗拒西方国家把西方文化强加于人的行为”（批判“全盘西化与西方主义”，1995年5月22日）。这不仅是中国的立场，也是当时新加坡的立场。

六、2000至2009年的报道

在2000年至2009年间，新加坡分别在2005、2007、2009年举办了三场五四运动纪念讲座，其中2009年的讲座主要以五四精神对早期新马社会、文学思想和文化上的影响为纪念讲座的主题。有些作者提到新马的文艺创作者将五四的新意识融入作品中，写出知青反抗旧礼教和男女平等等小说题材。但很多纪念报道更看重五四运动对新加坡的政治影响，甚至有两位新加坡的部长针对五四运动发表看法，这是过去没有的现象。在2009年5月举行的“五四运动的当代回想研讨会”中，时任教育部兼国家发展部高级政务部长的傅海燕就指出，五、六十年代新加坡参加学运、工运和社会运动的学生、工人和华文知识分子，在抗议社会上不公平现象时，他们的思想脉络，其实可以追溯到五四运动（五四运动的当代回想研讨会，2009年5月3日）。换言之，五四运动对新加坡的社会和政治发展史是有直接影响的。

另外，时任外交部长的杨荣文在新加坡中英文报章发表文章，指出“五四运动对新加坡的发展，也有着意义深远的影响。实际上，如果不提五四，是无法理解新加坡本身的国家主义的缘起和演变的。在初期，五四影响着所有的华社团体，包括商团和宗乡会馆、报刊、学校和学生团体以及文化团体。在当时，左倾是很自然的，因为没有一些革命热情，文化复兴是无从实现的。”（五四是新加坡丰富遗产的一部分，2009年5月4日）

接着，他提到新加坡国家主义的兴起，“在二次大战以后，新加坡本身的国家主义兴起，力图使本身和中国大陆的政治分离……经过迂回曲折的发展，人民行动党终于在同最初结盟的左倾共产党人的斗争中得胜，引领新加坡在1959年取得自治，然后在1965年全面独立。”（五四是新加坡丰富遗产的一部分，2009年5月4日）最后，杨荣文部长总结认为，“经过90年，五四对新加坡的影响，在占了我国人口四分之三的华族的文化复兴中依然可见。它在殖民地时期为华人社会注入的生命力和活力，令英国人感到害怕，也对新加坡的自治和独立，作出巨大贡献。这样的精神至今依然存在于新加坡的华人商团和宗乡会馆、南大、特选学校、华文报和本地众多的文化团体之中。”（五四是新加坡丰富遗产的一部分，2009年5月4日）杨荣文虽然表示他的言论仅代表个人，但他强调五四是新加坡丰富遗产的一部分，却是过去部长官员所不曾明白说清楚的，这或许也多少反映出新加坡官方对五四运动定位的调整。

新加坡对五四运动的定位明朗化或许与外在客观因素有关。首先是中国政府对五四运动的重新定义。中国官方在1989年的学生运动之后，一度冷却五四的纪念活动。之后刻意抹去五四运动所提倡的“民主”，而将五四运动包装成在党领导下的爱国运动，认为五四精神就是爱国精神（北京高调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五四精神就是爱国主义，2009年5月5日）。既然中国重新定义五四运动，那新加坡也无需刻意规避五四运动的纪念。其次，新加坡正面评价五四运动对新加坡政治发展史的影响，应该是受了两国之间越来越密切的经济联系所影响。从1994年的苏州工业园区再到2007年的新中天津生态城，新中经济合作越来越频繁。随着中国在国际贸易和经济的快速发展，新加坡对中国的投资也大幅度提升。在同样的时间段，中国也加大了对新加坡的投资。在这种经济和政治良好互动下，以五四运动纪念来加强新中两国的历史和文化联系也顺理成章了。当然，除了外在的客观条件成熟外，我们也不可忽略一些学者和知识分子长期关注五四运动的研究，他们在这段时期的五四周年纪念日会撰写文章或接受邀请，发表他们对五四运动的评论。

七、总结

从报章报道数量来观察，新加坡对五四运动纪念的关注，有明显的时代烙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至1970年代中期，新加坡出于政治考虑，必须与沉醉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斗争的中国保持一定的距离。五四运动在新加坡作为一个与共产主义及反帝国主义挂钩的政治运动，只能在官方的影响下接受被强烈批评的命运。即使新加坡和中国在1970年代关系升温，它也在政治的考量下被冷淡处理。接着1980年代的一系列学运让五四运动成为了中国政府的敏感话题，但这时期恰恰是新加坡五四纪念报章文章数量的一个小高峰。这或许是因为1970年代末新加坡政府对中华文化和语言政策的调整，让五四运动变成受华文教育的新加坡人怀念和感慨的一个文化象征。到了1990年代，五四运动因为1989年的天安门学生运动彻底成了中国的禁忌，而新加坡的报章也因政治敏感而减少报道五四话题。即使有所报道，也因为受到“亚洲价值”的提倡的影响，更注重的是东西方文化碰撞的问题。最后是2000年以来的十年间，新加坡和中国密切的经贸关系让新加坡五四运动纪念报道不只是数量的空前记录（共有43篇），而且内容也更加注重五四运动对新加坡的正面影响，甚至不讳言认为五四是新加坡丰富遗产的一部分。综上所论，新加坡对五四运动的纪念及报道的热络程度与那个时代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情境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并受到相对的制约。

附录1：新加坡报章有关五四运动的报道文章统计表

年段	数量（篇数）
1949 - 1965	9
1966 - 1976	3
1977 - 1989	26
1990 - 1999	11
2000 - 2009	43

资料来源：《南洋商报》（1949年5月-1983年5月）和《联合早报》（1984年5月-2009年5月）。

附录2：新加坡报章有关五四运动的报道（1949-2009）的篇目表

No.	日期	新闻/文章标题	备注
1.	1950/5/4	五四运动的意义	
2.	1951/5/6	中国文字的命运	提到当年白话文运动
3.	1951/5/4	五四运动的再认识	
4.	1953/5/3	旧文化与新文化	
5.	1954/5/4	新启蒙运动	
6.	1958/5/4	新文学运动纵横谭	
7.	1958/5/5	北京庆祝青年节	号召青年推广五四运动的革命传统
8.	1959/5/4	五四运动四十周年纪念大会郭沫若与刘宁一发言指责印度扩张主义者抄袭帝国主义者故技公开干预中国内政	
9.	1961/5/4	“五四”运动与刊物	
10.	1969/5/5	中国纪念五四运动智识份子有大缺点须以工农兵为导师参加进行阶级斗争增加生产发展科学	
11.	1973/5/5	庆祝中国青年节北京万余位青年参加持火炬赛跑	开幕仪式地点在五四运动的历史纪念地
12.	1976/5/5	五四运动五十七周年北京限制集会防范发生事件	

13.	1984/5/5	北京纪念五四运动	
14.	1987/5/4	中国纪念五四运动只有官方安排节目	
15.	1988/5/5	儒家思想能否抵御西方歪风？	提到五四运动批判儒家思想
16.	1989/5/4	五四前夕联名发出倡议书 中国一批知识分子支持学运要求改革	
17.	1989/5/4	中国当前学运于“五四”纪念	
18.	1989/5/4	意义和影响	一个新加坡华人写给“五四”的信
19.	1989/5/4	1919～1989不可分解的血缘关系	写给五四的信
20.	1989/5/5	警察无法阻止人群涌入天安门广场 三十万北京学生“五四”和平示威	
21.	1989/5/5	五四七十周年的反思	
22.	1989/5/6	港台报章评五四：五四运动感言	
23.	1989/5/6	港台报章评五四：庆祝五四，为民请命	
24.	1989/5/6	港台报章评五四：历史发展如此迂回	
25.	1989/5/7	中国五四学潮原动力的发源地——北京风貌	
26.	1989/5/7	写给五四	
27.	1989/5/7	给五四	
28.	1989/5/7	告别五四	
29.	1989/5/7	五四运动的尾巴？！	
30.	1989/5/8	忆胡适博士论学潮	五四代表人物和学潮的历史意义
31.	1989/5/10	断层的反思	反思五四运动
32.	1989/5/11	五四散章	
33.	1989/5/13	中台50余学者在北大举行五四学术讨论会	
34.	1989/5/19	学运是政治改革的起点	提到五四的精神
35.	1989/5/22	学生运动是矛盾的表面化	提到五四最大的悲剧

36.	1989/5/25	北京，一个令人兴奋的名字	提到学生运动符合五四精神
37.	1989/5/25	有良知和正义的写作者都应发扬五四精神	
38.	1989/5/31	跨越中西文学之间	五四运动后中国作家唾弃中国传统
39.	1991/5/31	五四与九七	
40.	1994/5/5	记念五四运动75周年	
41.	1994/5/5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纪念五四75周年	
42.	1995/5/22	批判“全盘西化与西方主义”	提到五四运动和全盘西化
43.	1996/5/5	上海青年热烈庆祝“五四”	
44.	1998/5/14	中国科教兴国的希望	提到五四先驱
45.	1999/5/4	历史上的今天	当天发生五四运动
46.	1999/5/4	杭州纪念“五四”运动80周年	
47.	1999/5/4	香港主办“五四新文化运动作家群象”书展	
48.	1999/5/9	五四是场文化觉醒	
49.	1999/5/10	重新评价五四	
50.	2000/5/7	新加坡作家协会永久会所开幕 五四新页	
51.	2003/5/5	“五四”与大学生谈防炎温家宝再提德先生赛先生	
52.	2003/5/7	五四看北大	
53.	2004/5/10	新五四运动	
54.	2005/5/1	五四想起一段厦大风云	
55.	2005/5/2	“五四运动”86周年纪念讲座	
56.	2005/5/5	说五四，心系岛国	
57.	2005/5/8	老先生的问题并不老	提到五四掀起了改革之风
58.	2005/5/9	五四精神与当前的新加坡	

59.	2005/5/24	重回五四的反思	
60.	2006/5/5	港青少年首次参加“五四”升旗礼	
61.	2006/5/5	温家宝吁青年追求民主科学	提到民主与科学的五四传统
62.	2006/5/5	马英九：提倡开明、守宪政府 今日台湾可借镜五四	
63.	2007/4/20	五四运动8周年纪念讲座 从反传统到回顾传统	
64.	2007/5/1	两学者主讲五四运动纪念讲座	
65.	2007/5/8	五四运动与社会主义的领导权	
66.	2009/5/1	看五四运动 对早期新马小说的影响	
67.	2009/5/3	谁该记得五四？	
68.	2009/5/3	五四与新华知识分子	
69.	2009/5/3	胡锦涛希望学生自觉到基层磨炼	提到五四运动对当今中国青年的启示
70.	2009/5/3	“五四运动”的当代回想研讨会	
71.	2009/5/4	中国“新文化”需要发展与搏弈	
72.	2009/5/4	根深叶茂看五四	
73.	2009/5/4	深刻认识“五四90”的全面影响	
74.	2009/5/4	五四是新加坡丰富遗产的一部分	
75.	2009/5/4	五四精神今安在？	
76.	2009/5/4	九十年一觉五四梦	
77.	2009/5/5	纪念“五四”九十周年 看五四运动 对早期新马小说的影响 下	
78.	2009/5/5	中国主义之争五四走过90周年	
79.	2009/5/5	中国仍然需要“五四精神”	
80.	2009/5/5	北京高调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五四精神就是爱国主义	
81.	2009/5/7	心中五四	
82.	2009/5/7	高高在上的“民主”和“科学”	提到五四精神
83.	2009/5/8	历史与现实	提到五四的历史问题

84.	2009/5/9	90年后的今天，还要五四吗？	
85.	2009/5/9	杨荣文谈“五四”引中国网民热议	
86.	2009/5/10	五四，六四——在港大的体会	
87.	2009/5/10	从“国耻日”回望“五四”	
88.	2009/5/11	长江大河看五四	
89.	2009/5/14	略议两岸和新加坡纪念“五四”运动	
90.	2009/5/18	被逐出境的校长	提到响应五四的尊孔校长
91.	2009/5/26	浮过90年	五四90年纪念
92.	2009/5/27	圣中师生回想五四	

资料来源：《南洋商报》（1949年5月-1983年5月）和《联合早报》（1984年5月-2009年5月）。孙雅惠、王捷灵初步整理，黄贤强编校和制表。

参考文献

北京高调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五四精神就是爱国主义2009。《联合早报》，5月5日，第13版。

重新评价五四1999。《联合早报》，5月10日，第33版。

崔贵强1989。〈新马华人国家认同的若干观察(1945—1959年)〉。《南洋问题研究》，第2期，2-9。

邓小平与新加坡2018。《联合早报》，11月12日，https://www.zaobao.com.sg/special/report/supplement/china-40-years-reform/edition/story20181112-906828

杜红1989。〈给五四〉。《联合早报》，5月7日，第40版。

港台报章评“五四”：五四运动感言1989。《联合早报》，5月6日，第16版。

黄贤强、施彦2009。〈五四纪念在新加坡——以华文报章的报道和华社记忆为中心〉。牛大勇、欧阳哲主生编《五四的历史与历史中的五四：北京大学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619-641。

金进2017。〈华校情结、代际区隔与国族意识——对新加坡华人国族意识建构历史的文学考察（1965-2015）〉。《外国文学研究》，第3期，165-175。

李亚男2014。〈中国与东南亚共产党关系的正常化及其影响——兼论中共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身份转换的完成〉。《攀登》，第3期，8-13。

李元瑾2009。〈是历史巧合抑或是互动模式？——中国两次社会变革与新加坡华人的回应〉。《世界民族》，第3期，51-61。

批判“全盘西化与西方主义”1995。《联合早报》，5月22日，第16版。
庆祝中国青年节北京万余位青年参加持火炬赛跑1973。《南洋商报》，5月5日，第2版。
五四运动的意义1950。《南洋商报》，5月4日，第1版。
五四运动的再认识1951。《南洋商报》，5月4日，第1版。
五四运动与刊物1961。《南洋商报》，5月4日，第16版。
五四运动五十七周年北京限制集会防范发生事件1976。《南洋商报》，5月5日，第1版。
五四是场文化觉醒1999。《联合早报》，5月9日，第30版。
五四运动的当代回想研讨会2009。《联合早报》，5月3日，第10版。
五四是新加坡丰富遗产的一部分2009。《联合早报》，5月4日，第10版。
写给“五四”1989。《联合早报》，5月7日，第40版。
中国当前学运与“五四”纪念1989。《联合早报》，5月4日，第12版。
中国纪念五四运动知识分子有大缺点 须以工农商兵为导师参加进行阶级斗争增加生产发展科学1969。《南洋商报》，5月5日，第20版。
1919 - 1989不可分解的血缘关系1989。《联合早报》，5月4日，第37版。